



現代中國文學史

钱基博◎著

【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学术文丛】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学术丛

現代中國文學史

钱基博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中国文学史/钱基博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7. 3
(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学术文丛)

ISBN 978 - 7 - 5068 - 5311 - 8

I. ①现… II. ①钱… III. ①中国文学 - 现代文学史 IV. ①I209.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1343 号

现代中国文学史

钱基博 著

图书策划 范洪军

责任编辑 刘 娜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北京汇智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 com. 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0.5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8 - 5311 - 8

定 价 6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者的话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学术思想来到中国，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长期束缚国人的思想禁锢得到解放；至二十世纪初，随着清帝逊位，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彻底宣告结束，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社会历史的新时代，也是思想学术的新时代。

在这个新的时代，随着海外留学的大力拓进、新学堂的纷纷建立、西学学理的广泛传播，国内各学术领域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时期，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这些学术大师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后世学人表率”之旨，撰著了一批对当时及后世的中国学术发展与演进均产生巨大影响的经典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的学术研究成果，全面展示了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立及发展过程。这些大师级学人的经典著述，虽经岁月的磨洗，至今仍然璀璨生辉，在诸多学术领域发挥着广泛影响。

民国初叶处于历史激变时期的大师级学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既受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洗礼，国学功底深厚；同时又接受过西方先进学术思想的熏陶，能够熟练运用所学西方先进的学术理念和科学方法，研究国是，探求真知；更重要的一点，他们有着严谨治学的态度，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他们令人叹为观止的学术成，正是建基于这种种主客观因素之上的。

还须指出的是，那一时期独立之精神、自由的思想与学术氛围亦十分重要，与孕育培养出学术大师、撰著出版学术经典密不可分。在今天的清华园中，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碑文，至今可谓

金声玉振、振聋发聩：“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载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是王国维的学术品格，也是民国初叶众多学术大师所共有的学术风范。

二十世纪已经渐渐远去。那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个激变的时代，更是一个留下了自己深深印痕的时代。那个时代所产生的众多人文学术大师及其学术成果，当时是、现在是、也将永远是我们国家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值得后人珍惜、继承和研究。

编辑出版这套《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学术文丛》，我们存有一个素朴的心愿：既坚持学术性与可读性并重的原则，亦以弘扬这些人文大师们的学术经典为指归，来进一步展示这些学术经典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本；让广大读者从中体悟到，阅读经典可以帮助人们深入理解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与博大精深。经典愈悠久，就愈具有长期的重要历史影响与现实作用。

整理出版这套文丛，可为广大读者提供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的中国学术精品。这些著述以历史、文学、哲学为主，不仅是近代各新学科的开山之作，亦是典范之作，业已经历时间检验，学术界对其有一定的肯定。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陈青之《中国教育史》等，皆为轰动当时并影响至今的经典学术著作，有些著作更是近年来第一次整理出版。

本次编辑整理这些著作，均以民国时期的初版为底本，用现代汉语标点符号标点，采用横排简体的形式出版。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对原书中一些词汇，包括人名、地名、书名及其译名皆仍其旧，不做改动，一般只做技术性处理。

盛世多撰述，盛世出好书，盛世重藏书。在今天这个中华民族最接近伟大复兴的时代，推出这套文丛，其嘉惠时人、流传后世意义不言而喻，出版者和广大读者当以此目标共勉。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年2月

序

余读班、范两《汉书》、《儒林传》分经叙次，一经之中，又叙其流别；如《易》之分施、孟、梁、丘，《书》之分欧阳、大小夏侯，其徒从各以类次，昭明师法；穷原竟委，足称良史。是编以网罗现代文学家，尝显闻民国纪元以后者。略仿《儒林》分经叙次之意，分为二派：曰古文学，曰新文学。每派之中，又昭其流别；如古文学之分文、诗、词、曲，新文学之分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而古文学之中，文有魏晋文与骈文、散文之别；诗有魏晋、中晚唐与宋诗之别，各著一大师以明显学；而其弟子朋从之有闻者，附著于篇。至诗之魏晋，其渊源实出王闳运、章炳麟，而闳运、炳麟已前见文篇，则详次其论诗于文篇，以明宗旨；而互著其姓名于诗篇，以昭流别；亦史家详略互见之法应尔也。特是学者猥众，难以悉载。今但录其卓然自名家者，著于篇。

又按《汉书·儒林》每叙一经，必著前闻以明原委；如《班书》叙《易》之追溯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范书》之必称《前书》是也。是编亦仿其意，先叙历代文学以冠编首；而一派之中，必叙来历，庶几展卷了如；要之以汉为法。特是规模粗具，而才谢古人。《汉传》经师，人系短篇，简而得要。仆纂文士，传累十纸，详而蘄尽。闻之前人：粤在明季，南浔庄氏为《明书》，中王阳明一传，有上下卷，共三百馀页；其冗长无体裁可知已！陈寅清《榴龕随笔》。传者以为笑。《书》曰：“辞尚体要。”言史之论纂，贵简不贵烦也。然史笔

贵能简要，而长编不厌求详。昔在鄞县万斯同季野草《明史》，每为一传，必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为长编，绵绵数十纸，传写者为腕脱；每语人曰：“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史之难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暗昧而不明，由无迁、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则事之信为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万先生传》。可谓有慨乎其言之！然则详者简之所自出也！会稽章学诚实斋亦言：“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光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为职故事、案牘、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于是有比次之法！”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报黄大俞先生》。仆少耽研诵，粗有睹记；信余言之不文，幸比次以有法。征文，则扬、马侈陈词赋，《汉书》之成规也。叙事，则王、谢详征轶闻，《晋书》之前例也。知人论世，详次著述，约其归趣，迹其生平，抑扬咏叹，义不拘虚，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叙录，吾极其详，而以俟后来者之要删焉。署曰长编，非好为多多益善也！吾为刘歆、贾护，而听人之为班孟坚焉！吾为二刘、范氏，而薪人之为司马君实焉！不亦可乎？

抑史家有激射隐显之法。其义昉于太史公，如叙汉高祖得天下之有天幸，而见意于《项羽本纪》，藉项羽之口以吐之曰：“非战之罪也，天也！”叙平原君之好客，而见意于《魏公子列传》，藉公子之言以刺之曰：“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事隐于此而义著于彼，激射映发，以见微旨。是编叙戊戌政变本末，详见《康有为》、《梁启超》

篇；而戊戌党人之不饜人意，则见义于《章炳麟》篇，藉章氏之论以畅发之，如此之类，未可更仆数；庶几史家激射隐显之义尔。至若林纾之文谈，陈衍之诗话，况周颐之词话，以及吴梅之曲话，其抉发文心，讨摘物情，足以观文章升降得失之故，并删其要，著于篇。亦《班书·贾谊传》载《政事诸疏》、《董仲舒传》录《天人三策》之例也。要之叙事贵可考信，立言蘄于有本。聊疏纂例，以当发凡。

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日

无锡钱基博叙于光华大学

绪 论

1. 文学

治文学史，不可不知何谓文学，而欲知何谓文学，不可不先知何谓文。请先述文之涵义。

文之含义有三：（甲）复杂。非单调之谓复杂。《易·系辞传》曰：“物相杂故曰文。”《说文·文部》：“文错画，象交文。”是也。（乙）组织。有条理之谓组织。《周礼·天官·典丝》：“供其丝纆组文之物。”注：“绘画之事，青与赤谓之文。”《礼记·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是也。（丙）美丽。适娱悦之谓美丽。《释名·释言语》：“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是也。综合而言：所谓文者，盖复杂而有组织，美丽而适娱悦者也。复杂，乃言之有物。组织，斯言之有序。然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故美丽为文之止境焉！

文之涵义既明，乃可与论文学。

文学之定义亦不一：

（甲）狭义的文学。专指“美的文学”而言。所谓美的文学者，论内容，则情感丰富，而不必合义理；论形式，则音韵铿锵，而或出于整比；可以被弦诵，可以动欣赏。梁昭明太子序《文选》：“譬诸陶匏为入耳之娱；黼黻为悦目之玩”者也。“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

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夫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名曰《文选》云耳。”所谓“篇什”者，《诗》、《雅》、《颂》十篇为一什，后世因称诗卷曰篇什。由《萧序》上文观之，则赋耳，诗耳，骚耳，颂赞耳，箴铭耳，哀诔耳，皆韵文也。然则经姬公之籍，孔父之书。非文学也，子（老庄之作，管孟之流）非文学也，史记事之史，系年之书。非文学也，惟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沈思”，“义归翰藻”，与夫诗赋骚颂之称“篇什”者，方得与于斯文之选耳！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以“扬榷前言，抵掌多识者谓之笔；咏叹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云：“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摇会，情灵摇荡。”刘勰《文心雕龙·总述》篇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有韵者文也。”持此以衡，虽唐宋韩、柳、欧、苏、曾、王八家之文，亦不得以厕于文学之林；以事虽出于沈思，而义不归乎翰藻；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者也。夫文学限于韵文，此义盖有由来；然而非其朔也。大抵六朝以前，所谓“文学”者，“著述之总称”，所包者广。六朝以下，则“文学”者，“有韵之殊名”，立界也严。其大较然也。然吾人倘必持狭义以绳文学，则所谓文学者，殆韵文之专利品耳！倘求文学之平民化，则不得不舍狭义而取广义。

（乙）广义的文学。“文学”二字，始见《论语》，子曰：“博学于文。”“文”指《诗》、《书》六艺而言，不限于韵文也。孔门四科，文学子游、子夏，不闻游、夏能韵文也。《韩非子·五蠹》篇力攻文学而指斥及藏管、商、孙、吴之书者，管、商之书，法家言也；孙吴之书，兵家言也；而亦谓之文学。汉司马迁《史记·自序》曰：“汉兴，

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举凡律令、军法、章程、礼仪，皆归于文学。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凡六略：“六艺”百三家，“诸子”百八十九家，“诗赋”百六家，“兵书”五十三家，“数术”百九十家，“方技”三十六家，皆入焉。倘以狭义的文学绳之，六略之中，堪入“艺文”者，惟“诗赋”百六家耳；其“六艺”百三家，则《萧序》所谓“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也；至《国语》、《国策》与夫《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之并隶入“春秋”家者，则《萧序》所谓“记事之史，系年之书”也。诸子、兵书、方技、术数之属，则《萧序》所谓“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者也。然则“文学”者，述作之总称，用以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表诸文章，兼发智情：其中有偏于发智者，如论辩、序跋、传记等是也。有偏于抒情者，如诗歌、戏曲、小说等是也。大抵知在启悟，情主感兴。《易》、《老》阐道而文间韵语，《左》、《史》记事而辞多诡诞，此发知之文而以感兴之体为之者也。后世诗人好质言道德，明议是非，作俑于唐之昌黎，极盛于宋之江西，忘比兴之旨，失讽谕之义，则又以主情之文而为发知之用矣！譬如舟焉，智是其舵，情为帆棹；智标理悟，情通和乐，得乎人心之同然者也。

文学与哲学科学不同：

哲学解释自然 乃从自然之全体观察，复努力以求解释之。

科学实验自然 乃为自然之部分的观察，以求实验而证明之。

文学描写自然 科学家实验自然之时，必离我于自然，即以我为实验者之谓也。文学家描写自然之时，必融我入自然，即我与自然为一之谓也。

2. 文学史

文学之义既明，请论史之为物。

《说文·史部》：“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正也。”然则史之云者，又《说文》：“又，手也。”持中以记事也；中者，不偏之谓，章炳

麟曰：“记事之书，惟为客观之学。”夫史以传信，所贵于史者，贵能为忠实之客观的记载，而非贵其有丰厚之主观的情绪也，夫然后不偏不党而能持以中正。推而论之，文学史非文学。何也？盖文学者，文学也。文学史者，科学也。文学之职志，在抒情达意。而文学史之职志，则在纪实传信。文学史之异于文学者，文学史乃纪述之事，论证之事；而非描写创作之事；以文学为记载之对象，如动物学家之记载动物，植物学家之记载植物，理化学家之记载理化自然现象，诉诸智力而为客观之学，科学之范畴也。不如文学抒写情志之动于主观也。更推是论之，太史公《史记》不为史。何也？盖发愤之所为作，工于抒慨而疏于记事：其文则史，其情则骚也。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不为文学史。何也？盖褒弹古今，好为议论，大致主于扬白话而贬文言；成见太深而记载欠翔实也。夫纪实者，史之所为贵；而成见者，史之所大忌也。於戏！是则偏之为害，而史之所以不传信也。史之云者，又持中以记事也。《周书·周祝》、《荀子·性恶》注：“事，业也。”又《荀子·非十二子》注：“事业谓作业也。”然则记事云者，记作业也。史之云者，持中正之道记人之作业也。文学史云者，记吾人之文学作业者也，然则所谓中国文学史者，记中国人之文学作业云尔。

中国无文学史之目，文史之名，始著于唐吴兢《西斋书目》，宋欧阳修《唐书·艺文志》因之；凡《文心雕龙》、《诗品》之属，皆入焉。后世史家乃以诗话、文评别于总集后出一文史类。《中兴书目》曰：“文史者，所以讥评文人之得失。”盖重文学作品之讥评，而不重文学作业之记载者也。有史之名而亡其实矣！

自范曄《后汉书》创《文苑传》之例，后世诸史因焉；此可谓之文学史乎？然以余所睹记：一代文宗往往不厕于文苑之列！如班固、蔡邕、孔融不入《后汉书·文苑传》，潘岳、陆机、陆云、陈寿、孙楚、干宝、习凿齿、王羲之不入《晋书·文苑传》，王融、谢朓、孔稚珪不入《南齐书·文学传》，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王融、谢朓、江淹、任昉、王僧孺、沈约、徐陵不入《南史·文学传》，元结、韩

愈、张籍、李翱、柳宗元、刘禹锡、杜牧不入《旧唐书·文苑传》，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陈亮、叶适不入《宋史·文苑传》，宋濂、刘基、方孝孺、杨士奇、李东阳不入《明史·文苑传》，然则入《文苑传》者，皆不过第二流以下之文学家尔！且作传之旨，在于铺叙履历，其简略者仅以记姓名而已！于文章之兴废得失不赞一辞焉！呜呼！此所以谓之“文苑传”，而不得谓之“文学史”也！盖文学史者，文学作业之记载也；所重者，在综贯百家，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洞流索源，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说；在记载文学作业，而不在铺叙文学家之履历。文学家之履历，虽或可藉为考证之资，欧西批评文学家尝言：“人种、环境、时代三者构成艺术之三要素也；欲研究一种著作，不可不先考究作者之人物、环境及时代。”质而言之：即不可不先考证文学家之履历也。然而所以考证文学家之履历者，其主旨在说明文学著作。舍文学著作而言文学史，几于买椟还珠矣！

文学著作之日多，散无统计，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藪矣！昔挚虞始作二书：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文章志》四卷，《文章流别》三十集，见《晋书》本传。今其书佚不见，而体裁犹可悬揣而知；盖《志》如今之严氏《全上古三代文》，以人为纲；而《流别》疑如姚氏《古文辞类纂》，以文体为纲者也。尔后作者，代不乏人：梁昭明太子之《文选》，宋姚铉之《唐文粹》，吕祖谦之《宋文鉴》，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元苏天爵之《元文类》，明唐顺之之《文编》，黄宗羲之《明文海》，清严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姚鼐之《古文辞类纂》，姚椿之《国朝文录》，李兆洛之《骈体文钞》，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钞》，王先谦、黎庶昌之《续古文辞类纂》，王闿运之《八代文选》，其差著者也。然有文学著作而无记载；以体裁分而鲜以时代断；于文章嬗变之迹，终莫得而窥见焉。则是文学作品之集，而非文学作业之史也。独严氏书仿明梅鼎祚《文纪》，起皇古迄隋，博搜毕载，是为总集家变例；然与史有别者，以所攷兀者，不在文学作业之记载，而在文学作

品之集录也。此只以与文史、文苑传，供文学史编纂之材料焉尔！

昔刘知几谓作史有三难，曰才，曰学，曰识。而余则谓作史有三要，曰事，曰文，曰义，孟子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者也。夫文学史之事，采诸诸史之文苑；文学史之文，约取诸家之文集；而义则或于文史之属有取焉。然设以人体为喻：事譬则史之躯壳耳，必敷之以文而后史有神彩焉，树之以义而后史有灵魂焉！余以为作中国文学史者，莫如义折衷于《周易》，文裁则于班、马。《易·系辞传》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又曰：“《易》有圣人之道……以动者尚其变……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而文学史者，则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此文学史之所谓取义也。至司马迁作《史记》，于六艺而后，周、秦诸子，若孟、荀、三邹、老、庄、申、韩，管、晏、屈原、贾生、虞卿、吕不韦诸人，情辞有连，则裁篇同传；知人论世，详次著述，约其归趣，详略其品，抑扬咏叹，义不拘墟，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其后《班书》合传，体仍司马而参以变化；一卷之中，人分首尾；两传之合，辞有断续；传名既定，规制綦密。然逸民四皓之属，王、贡之附庸也；王吉、韦贤诸人，《儒林》之别族也；附庸如颛臾之寄鲁，署目无闻；别族如田陈之居齐，重开标额；征文，则相如侈陈词赋；辨俗，则东方不讳谐言；盖卓识鸿裁，犹未可量以一辙矣！此尽可取裁而以为文学史之文者也。然而世之能读马、班书而通其例者鲜！读《周易》而发其义于史者尤鲜！太史公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可谓观其会通者矣！所惜者，观会通于帝王卿相之事者为多，观会通于天下之动者少，不知“以动者尚其变”耳！

3. 现代中国文学史

吾人何为而治文学耶？曰：“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治史之大用，在博古通今，藏往知来。盖

运会所届，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此史之所以为贵。而文学史者，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民国肇造，国体更新；而文学亦言革命，与之俱新。尚有老成人，湛深古学，亦既如荼如火，尽罗吾国三四千年变动不居之文学，以缩演诸民国之二十年间；而欧洲思潮又适以时澎湃东渐；人主出奴，聚讼盈庭，一哄之市，莫衷其是！椎而为论，其弊有二：一曰执古，一曰骛外。何为骛外？欧化之东，浅识或自菲薄，衡政论学，必准诸欧；文学有作，势亦从同，以为“欧美之学，不异活言，家喻户晓，故平民化。太炎、畏庐，今之作者，然文必典则，出于尔雅；若衡诸欧，嫌非平民。”又谓：“西洋文学，诗歌、小说、戏剧而已。唐宋八家，自古称文宗焉；倘准则于欧美，当摈不与斯文。”如斯之类，今之所谓美谈；它无谬巧，不过轻其家丘，震惊欧化，降服焉耳！不知川谷异制，民生异俗，文学之作，根于民性；欧亚别俗，宁可强同！李戴张冠，世俗知笑，国文准欧，视此何异。必以欧衡，比诸削足；屡则适矣，足削为病！兹之为弊，溢曰“骛外”！然而茹古深者又乖今宜；崇归、方以不祧，鄙剧曲为下里，徒示不广，无当大雅！兹之为弊，溢曰“执古”！知能藏往，神未知来，终于食古不化，博学无成而已！或难之曰：“子之言自论文耳！倘文学言史，舍古何述？宁不稽古，即可成史！”请晓之曰：史不稽古，岂曰我思。然史体藏往，其用知来；执古御今，柱下史称；生今复古；溢以愚贱！文学为史，义亦无殊；信而好古，只以明因；阐变方今，厥用乃神；顺应为用，史道光焉！吾书之所为题“现代”，详于民国以来而略推迹往古者，此物此志也。然不题“民国”而曰“现代”，何也？曰：“维我民国，肇造日浅，而一时所推文学家者，皆早崭然露头角于让清之末年；甚者遗老自居，不愿奉民国之正朔；宁可以民国概之。而别张一军，翹然特起于民国纪元之后，独章士钊之逻辑文学，胡适之白话文学耳。然则生今之世，言文学而必限于民国，斯亦廛矣！”治国闻者，倘有取焉！

编 首

1. 总论

昔清儒焦循以为一代文学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而胡适亦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披二十四朝之史，每一鼎革，政治、学术、文艺，亦若同时告一起讫，而自为段落。然事以久而后变，道以穷而始通，殷因夏礼，周因殷礼，其所损益者微也。秦燔诗书，汉汲汲修补，惟恐不逮；其所创获者浅也。六代骈俪沿东京之流。北朝浑朴启古文之渐。唐之律诗，远因陈、隋。宋之诗馀，又溯唐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欲私淑孟、庄、荀、韩以复先秦之旧也。元之姚、虞，明之归、柳，清之方、姚，又祖述韩、柳、欧、苏以迫唐宋之遗也。是则代变之中，亦有其不变者存！然事异世变，文学随之，积久而著，迹以不掩；而衡其大较，可得而论；兹以便宜分为四期：第一期自唐虞以迄于战国，名曰上古；骈散未分，而文章孕育以渐成长之时期也。第二期自两京以迄于南北朝，名曰中古；衡较上古，文质殊尚。上古之文，理胜于词。中古之文，渐趋词胜而词赋昌，以次变排偶，驯至俪体独盛之一时期也。第三期自唐以迄元，谓之近古。中古之世，文伤于华。而近古矫枉，则过其正，又失之野；律绝之盛而词曲兴，骈

文之敝而古文兴，于是俚体衰而诗文日趋于疏纵之又一时期也。第四期明清两朝以迄现代。唐之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宋之言文章者宗之；于是唐宋八大家之名以起！而始以唐宋为不足学者，则明之何景明、李梦阳也。尔后谭文章者，或宗秦汉，或持唐宋，门户各张。迄于清季，词融今古，理通欧亚，集旧文学之大成而要其归，蜕新文学之化机而开其先！虽然，中国文学史之时代观，有不可与学术史相提并论者。试以学术言：唐之经学，承汉魏之训诂而为正义，佛学袭魏晋之翻译而加华妙，似不宜与宋之理学比，而附于陈、隋之后为宜。而自文学史论：沈、宋出而创律诗，韩、柳出而振古文，温、韦出而有倚声，则开宋元文学之先河，而以居宋元之首为宜。故谓学术史之第二期，始两汉而终五代，与文学史同其始而不同其终。而第三期则始于宋而终明，与文学史殊其终，并不同其始。盖明之学术，实袭宋朱、陆之成规而阐明之；不如文学之有何、李、王、李复古运动，轩波大起也。试得而备论焉。

2. 上古

呜呼！文章之作也，其于韵文乎？韵文之作也，其于声诗乎？声诗之作也，其于歌谣乎？盖生民之初，必先有声音而后有语言，有语言而后有文字；故在六书未兴之前，人禀七情以生，应物斯感；感物吟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譬之林籁结响，调如竽笙；泉石激韵，和若球铎；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朱襄《来阴》之乐，包牺《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阏》，娲皇之《充乐》，其声诗之鼻祖也。惟上古之时，文字未著，徒有讴歌吟咏，纵令和以土鼓苇籥，必无文字雅颂之声，如此，则时虽有乐，容或无诗，譬之则瑶僮之跳苗歌耳！是以缙绅士夫，莫得而载其辞焉，厥为有音无辞之世！是后鸟迹代绳，文字初炳，作始于羲皇之八卦，大备于黄帝之六书，而年世渺邈，则声采莫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尧时有《康衢歌》、《击壤歌》，虞舜有《卿云》、《南风》、《明良喜起》等歌，始有依声按韵，诵其言，咏其声，播之篇什